



| 政治文化研究译丛 | 丛日云 卢春龙 / 主编 |

ROBERT D. PUTNAM

【美】罗伯特·D.帕特南 / 主编

流动中的民主政体

当代社会中社会资本的演变

Democracies in Flux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李 筠 王路遥 张会芸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政治文化研究译丛 | 丛日云 卢春龙 / 主编 |

ROBERT D. PUTNAM

【美】罗伯特·D.帕特南 / 主编

流动中的民主政体

当代社会中社会资本的演变

Democracies in Flux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李 筠 王路遥 张会芸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动中的民主政体：当代社会中社会资本的演变/（美）帕特南（Putnam, R. D.）主编；李筠，王路遥，张会芸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6

（政治文化研究译丛）

ISBN 978-7-5097-5802-1

I. ①流… II. ①帕… ②李… ③王… ④张… III. ①政治文化—研究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8705号

· 政治文化研究译丛 ·

流动中的民主政体

——当代社会中社会资本的演变

主 编 / 罗伯特·D. 帕特南

译 者 / 李 筠 王路遥 张会芸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皮书出版分社 (010) 59367127

电子信箱 / pishubu@ssap.cn

项目统筹 / 邓泳红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桂 芳

责任校对 / 师敏革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版 次 / 2014年6月第1版

印 次 /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5802-1

著作权合同 / 图字01-2011-0304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89.00元

印 张 / 29

字 数 / 532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opyright© 2002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New York

Copyright licensed by Verlag Bertelsmann Stiftung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 in Germany as *Gesellschaft und Gemeinsinn* by Robert D.

Putnam (ed.) by Verlag Bertelsmann Stiftung, Gütersloh. © Copyright 2001

By Verlag Bertelsmann Stiftung

本书根据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New York 2002 年版译出

总 序

丛日云 卢春龙

政治文化研究在政治学学科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政治学中最有实践意义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也是成果最丰富的研究领域之一。

当代政治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阿尔蒙德把政治文化理解为政治系统的心理取向，包括所有与政治相关的信念、价值和态度等。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就是“针对政治对象的取向模式在该民族成员中间的一种特殊分布”，是“内化于民众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的政治系统”。当代政治文化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学者英格尔哈特把政治文化定义为“与一个群体或社会流行的政治信念（beliefs）、规范（norms）和价值相关的所有政治活动”。

政治文化是重要的政治现象，也是在寻找政治因果关系时必须考虑的重要解释变量。因而，在西方思想史和学术史上，对政治文化的研究源远流长。英格尔哈特在追溯现代政治文化研究的历史渊源时，曾列举一系列里程碑式的代表作品和成果，包括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托克维尔的《论美国民主》、阿道尔诺的《威权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拉斯韦尔的《民主性格》（*Democratic Character*）、斯托弗的《共产主义、一致性与公民自由》（*Communism, Conformity & Civil Liberties: A Cross Section of the Nation Speaks Its Mind*）、罗基奇的《开放和封闭的精神——对信仰和人格系统性质的调查》（*The Open and Closed Mind: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and personality systems*）等。此外，一些学者还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列入其中。与当代科学化的以数据分析为基础的政治文化研究相比，这种研究在方法论上被视为“非科学的”，但也有其重要价值。在中国，自19世纪末起，学者们在讨论中西文化关系、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时，也大量涉及政治文化的内容。

布林特教授曾区分和全面梳理了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三大谱系，即法国的社会学谱系、德国的文化哲学谱系以及美国的政治科学谱系。法国的社会学谱

系开始于孟德斯鸠，经过卢梭、斯戴尔、贡斯当、基佐以及托克维尔的发展而成为一个重要流派。这一流派强调从社会宏观背景的差异去理解各国政治文化的差异，进而理解各国政治制度的差异。德国的文化哲学谱系开始于康德，经过赫尔德、洪堡、黑格尔、马克思和韦伯等人的发展而成为一个重要流派。这一流派强调解释学的传统，强调政治文化并不是对客观社会现实的抽象反映，而是一个国家历史、文化象征、图腾长期积累的产物，强调从解释学的角度去理解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历史由来。美国的政治科学谱系开始于阿尔蒙德与维巴的开创性研究，这一谱系主张通过实证的、科学的方式来研究政治文化，从而克服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的弊端，他们在方法论上主张以对各国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观念调查为基础，进而对各国的政治文化进行精确的科学测量。

当代政治文化研究以美国的政治科学谱系为主流。1956年阿尔蒙德正式提出“政治文化”概念，1963年他又与维巴合作出版了《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此为当代科学的政治文化研究，亦即跨民族的抽样数据研究的开端。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包括英格尔斯的《人的现代化》，派伊的《中国政治的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斯里德曼的《人格与民主政治》（*Personalit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英格尔哈特的《寂静的革命：变化中的西方公众的价值与政治行为方式》（*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本菲尔德的《落后社会的道德基础》（*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等。

进入20世纪70年代，政治文化研究受到来自马克思主义等左翼思潮和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和挑战，许多学者批评它保守、静止、简单，存在文化偏见和文化决定主义倾向，低估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作用，不具有解释力和预见性等。政治文化研究一度走向衰落，退居政治学的边缘。但是，从80年代起，政治文化研究经历了从“回归”到“复兴”进而走向繁荣的过程。英格尔哈特在1988年最早使用了“政治文化的复兴”这一概念，而后，H. J. 威尔达、阿尔蒙德和布林特等人也肯定了政治文化复兴的到来。复兴后的政治文化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一大批有影响、有重大原创性贡献的成果问世：英格尔哈特的《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现代化、文化变迁和民主：人类发展时序》（*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与维尔泽合著），英格尔斯的《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 A Psycho-Social Perspective*），尤斯拉纳的《信任的道德基础》（*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rust*），

帕特南的《流动中的民主政体——当代社会中社会资本的演变》(*Democracies in Flux: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Contemporary Society*)、《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布林特的《政治文化的谱系》(*A Genealogy of Political Culture*)，狄百瑞的《亚洲价值与人权：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Asian Values and Human Rights: A Confucian Communitarian Perspective*)，达尔蒙德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与民主》(*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等。

政治文化研究关注政治系统的内在心理层面，强调政治文化是决定政治主体的行为准则和支配其政治活动的重要因素，因此，政治文化对于了解一个国家正式制度框架下的政治行为，理解历史上一个国家特殊的发展模式，都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政治文化研究还特别与政治发展和民主化研究有密切关系，它与经济发展、公民社会、国际环境、政治战略、政治精英等一起，构成解释一个国家政治发展和民主化进程与模式的重要的自主性变量。

政治文化研究在今天的中国更有一层特殊的意义。中国文明作为世界上独特的文明，也是规模最大的文化单元，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性格和政治文化。在当代社会政治转型时期，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在现代化潮流冲击下发生了何种变化？变化的方向是什么？它对于政治发展、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公民文化建设会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都需要当代学者作出科学的调查和分析。只有对中国社会的文化心理、政治态度、价值观念的分布状况和变化趋势了然于胸，才能明确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和道路选择，才能积极有效地推动传统臣民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转型。但是，目前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仍然以学者的观察、粗糙的文献分析为主要手段，以对传统政治文化的阐释性研究为主要内容，这种研究虽然富于学理性和启发性，但是，没有科学的量化数据为基础，也缺少可操作性，尚不足以为当前政治改革提供切实有效的支持。

为了推动我国的政治文化研究，需要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理论和经验，也需要直接引进西方的一些研究成果。遗憾的是，虽然国内学界许多人都在谈论政治文化，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对西方政治文化的研究成果只有零星的译介，大量政治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对于国内学者来说还是陌生的。这是国内政治文化研究长期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

有鉴于此，我们编译了这套《政治文化研究译丛》，希望为国内学者的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学术资源。我们期待着，这套丛书的出版，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政治文化研究，推动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走向繁荣，贡献出一批与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地位和独特性相称的研究成果。

罗伯特·帕特南： 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倡导者

（序）

卢春龙

在过去三十年内，社会资本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吸引了大批比较政治学者和民主理论家的注意，并进而成为政治发展领域里的一个热门话题。大多数学者指出，在一个民主社会或共同体内，社会资本的存在，会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维持政治秩序和政治系统的稳定。正如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指出的，近来社会资本理论的崛起回答了一个自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以来的经典政治学命题：一个民主政体的良性运转依赖于其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1〕}

根据罗伯特·帕特南的研究，公民对正式社会组织（formal social organization）和非正式社会网络（informal social networks）的参与，会提高他们之间的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程度并培育互惠互利（reciprocity）的道德规范，从而增强他们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通过这些社会组织和非正式社会网络，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道德规范（比如社会信任），同一共同体内的公民可以更有效率地组织集体行动来解决他们共同面临的公共问题，并对政府施加影响来保证这些问题的解决。因此，在一个民主社会或共同体内，充足的社会资本会产生很多正面效应：如促使公民关心公共事务、参与政治，最重要的是能维护民主政体的良性运转。

一 罗伯特·帕特南其人其作

罗伯特·帕特南于1941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的罗切斯特，1970年毕业于耶

〔1〕 Robert Putnam, Robert Leonardi and Raffaella Nanetti,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之后，他任教于美国密歇根大学。1979 年进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任教至今，并在此期担任过院长，现在是公共政策马尔林讲座教授。

罗伯特·帕特南是当代西方著名政治学家，2001 ~ 2002 年担任过美国政治学学会会长，2001 年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此外他还是英国科学院的研究员（fellow）。他一共出版了 14 本书，其中包括成名之作《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1〕} 最畅销的《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以及本书《流动中的民主政体：当代社会中社会资本的演变》。

2013 年，帕特南教授被奥巴马总统授予美国国家人文奖章（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荣誉，用以奖励一些成就突出的个人或社会团体，以表彰他们的工作加深了美国民众对于重要的人文资源的认识，拓宽了美国公民参与这些重要人文资源的渠道，或有助于保护和扩大美国公民对于这些重要人文资源的接触。

帕特南教授在接受这一奖项时说：“我很高兴能够荣获这一重要的奖项，特别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大部分的功劳属于我的卓越的学生和研究团队，多年来，他们与我一起工作，重新主张社区（community）的力量”。

白宫新闻办公室的秘书发表声明说：“帕特南深化了我们对于美国社区的认知。研究不同参与的模式如何导致分裂与团结，帕特南教授的写作和研究启发我们，改善制度以使得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更有价值，他的洞察激励我们成为更好的公民。”

《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是帕特南教授的成名之作。这部专著奠定了帕特南在西方学术界的权威地位，他因之被誉为与托克维尔齐名的学术大家，因为他与托克维尔一样强调社区居民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

帕特南在该书中对 1970 年意大利开始的一场打破长期的中央集权模式、将权力下放到全国 20 个地区政府的政治变革进行了长达 20 年的追踪调查，在此基础上，他运用统计分析、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回答了一个最为重要的民主理论问题：“为什么有些民主政府获得了成功而有些却失败了？”虽然意大利 20 个地区政府同时开始民主化制度改革，但它们各自的制度绩效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而且，这种差距具有一定稳定性。具体说来就是，北方地区的民主制度绩效比南方地区高。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样一种民主制度的绩效差异呢？针对这个问

〔1〕 Robert Putnam, Robert Leonardi and Raffaella Nanetti,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题，帕特南提出了自己的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是公民的参与、政治平等、团结、信任、宽容和社团组织，他发现地区政府的绩效与该地区社会资本的丰富程度之间存在着不同寻常的吻合关系，社会资本的解释力比经济发展的解释力更强，一个地区的社会资本越丰富，地区政府的运转就越有效。

帕特南进而从比较历史分析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他发现，在意大利北方，传统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减弱了；在意大利南方，它们却得到了加强。在意大利北方，重要的社会、政治甚至宗教上的信任和合作都是横向的（horizontal）；而在南方它们却是垂直的。合作、互助、公民承担义务，甚至包括信任都是北方的显著特点。相反，南方的主要特点则是等级制度、疏离与秩序。

最后，帕特南得出结论说，一个地区的社会资本越丰富，人们的公共精神就越发达，那么该地区的民主制度绩效就越高。反之，则相反。这样，社会资本理论就成功地解释了意大利南北地区在社会资本和制度绩效方面的差异。

《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1〕}是帕特南教授最为畅销的一本书，也是受到美国社会极大关注的一本书。当时的克林顿总统为此专门邀请帕特南前往白宫会谈，美国最有影响的杂志《人物》对此也进行专门报道。帕特南认为，民主质量的好坏或民主制度的绩效，可以从公民参与社会组织的情况得到解释；如果某一个社会的民主运转出了问题，从根本上说，那一定是公民参与社会组织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例如，公民不太愿意参与社会团体的活动了，社区的公共生活便走向了衰落。帕特南通过对当代美国社会的深刻分析敏锐捕捉到，当初托克维尔所描述的美国社区公共生活正在逐渐衰落，那种喜好结社、喜欢过有组织的公民生活、关注公共话题、热心公益事业的美人不见了；今天的美国人，似乎不再愿意把闲暇时间用在与邻居一起在咖啡馆聊天，一起走进俱乐部去从事集体活动，而是宁愿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或者独自去打保龄。于是，帕特南想到用“独自打保龄”这个词来形容和概括美国社会的这一深刻变化，并力求对这种变化的本质做出理论解释。在他看来，“独自打保龄”的现象意味着美国社会资本的流失，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非常复杂的，帕特南对此并没有能够给出非常明确的解释。

社会资本的流失意味着什么呢？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的流失对美国民主的质量以及良性运转构成了重大挑战，美国公民开始变得不再关注公共事务，投票率持续下降，政治参与热情日益降低。由于缺少公民的关注以及参与，美

〔1〕 Robert Putnam, *Bowling Alon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国民民主的运行就缺少了来自民众的实质性监督。帕特南担心长此以往，托克维尔当初所强调的美国式民主就会日益退化，变成了徒有形式、缺失本质的形式民主。

在全书的最后，帕特南教授呼吁要重新振作美国社区的精神，向当初托克维尔所描述的美国社区公共生活回归，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帕特南教授被称为“新托克维尔主义者”。如何重新振作美国社区的精神呢？帕特南提供了一些现实的可行建议，这些建议得到了克林顿总统的高度认可。

二 本书的主要内容与观点

本书《流动中的民主政体：当代社会中社会资本的演变》^{〔1〕}由帕特南主编，由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在该书中，帕特南汇聚了一批顶级学者来研究世界上八个发达民主社会（澳大利亚、法国、德国、英国、日本、西班牙、瑞典和美国）中的社会资本状况。这本书充满了许多耐人寻味的启示。研究者们注意到，例如，人们参与工会、教会和政党的比率日益降低似乎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一个令人不安的发现就是，因为这些形式的社会资本对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不那么富裕的人尤其重要。事实上，研究人员发现，在一般情况下，更富裕的社会群体与工人阶级相比更有可能参加社会团体的活动。研究人员还发现，年轻一代更加不关心政治、不信任政治家和其他人、对公共事务玩世不恭并且不太愿意参加社会团体的活动。这些证据都表明，社会资本在八个发达民主社会之中日益下滑，这样的发现多多少少呼应了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一书中的发现。对此发现，帕特南与其他研究人员表示了强烈的不安，因为社会资本——具体表现为团结、同情、信任和社会结社——既对我们社区与社会的健康非常重要，也对我们自身的心理健康非常重要。

关于社会资本的定義与测量，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主张，因为社会资本本身就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帕特南与其他研究人员在该书中认为，社会资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客观的社会网络和组织，二是一系列相对主观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客观的社会网络和组织包括正式的社会组织和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它们在成员自愿的基础上形成，尊重并代表成员的利益。成员根据自己的意愿可以选择自由参与或退出这些社会网络和组织。在这些社会网络和组织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平等的横向（horizontal）

〔1〕 Robert Putnam, ed., *Democracies in Flux: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关系而不是服从和命令的垂直（vertical）关系。主观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主要包括社会成员的相互信任程度以及互惠互利的道德规范。根据帕特南与其他研究人员的观点，社会资本的客观和主观部分在分散的个人之间起到了“调节性的作用”，在自愿的基础上把社会个体凝聚起来，从而有利于解决个体所无法解决的社会公共问题。

在该书中，帕特南及其他研究人员还区分了两种形态的社会资本：桥联性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和黏合性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桥联性社会资本，在客观维度上，主要由一些开放性的社会网络所组成，这些网络把具有不同经济、社会甚至政治背景的人联系起来。在主观维度上，桥联性社会资本主要包括人们之间的“无区别的”、普遍性的社会信任以及互惠互利的道德规范，这一社会信任不以彼此认识或有相同的背景为基础。

黏合性社会资本，在客观维度上，主要由一些排他性的社会网络所组成，这些网络由那些有着共同经济、政治或者人口特征的人所组成。因此，这些网络往往会把那些不拥有这些特征的人或群体排除在外。在主观维度上，黏合性社会资本主要包括那些“区别性的”、特殊性的人际信任，这一特殊性的人际信任以彼此认识或拥有相同的背景为基础。

在结论部分，帕特南忧心忡忡地总结道，社会资本的下滑是八个发达民主社会（澳大利亚、法国、德国、英国、日本、西班牙、瑞典和美国）的共同主题：到教堂做礼拜的人数大量下降、工会会员急剧减少。这一社会资本下滑带来的后果更令人不安：人们的公共精神开始减少，投票率日益下降，对政党内的事务日益不关心。更令人不安的是，帕特南总结说，由于代际的转换（generational replacement），年轻一代与年老一代相比，更加缺乏参与社会团体的热情，因而更加缺乏社会资本。还有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是，社会资本拥有数量的不平等似乎与阶级地位的不平等吻合了，富裕的中产阶层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而贫穷的工人阶级拥有更少的社会资本，而这种社会资本拥有数量的不平等只会进一步分裂社会，同时使得贫穷的下层阶级陷入困境之中。

三 帕特南社会资本理论的贡献与面临的挑战

帕特南及其带领的研究团队在过去几十年之中一直关注社会资本的研究，并因此获得“新托克维尔主义者”的称呼，成为政治学理论领域最受关注的理论之一。帕特南本人也获得美国社会与政治界的诸多荣誉，2013年的美国国家人文奖章就是最好的例证。最近十年，每年在重要的英文学术期刊——入选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关于社

会资本的论文都有数百篇。由此可见，社会资本理论近些年来在理论界的流行程度。

当然，与赞誉相伴随的就是批评，在过去三十年里，对于帕特南的批评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对于社会资本的测量是否有效度；第二，社会资本在美国的下滑是不是一个事实；第三，社会资本与民主运转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首先，正如笔者前面说过的，社会资本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同的学者在量化社会资本时会侧重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帕特南在量化社会资本时，侧重社会成员对正式社会组织的参与。这一测量方法在方法论上强调以通过随机社会调查来衡量一个社会的社团参与程度，在调查中研究人员会设计一系列问题来衡量被调查者对社会团体和网络的参与程度，然后根据调查结果，研究人员通过样本中被调查者对社会团体和网络的参与程度去推论社会整体层次上的社团参与程度。

不过这一测量方法受到了福山（Fukuyama）的质疑。福山认为社会资本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是一个社会的整体属性，无法分解，也无法通过个体层面的社团参与程度去进行推论。换言之，帕特南的测量方法或多或少犯有方法论上的化约主义错误。福山主张对一个给定社会里的社会团体数目以及社会团体成员资格进行普查，在此普查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计算这个社会的总体社会资本存量状况。因此，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总量就等同于这个社会里所有社会团体成员资格的总和。不过，福山也承认这样的普查几乎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任务。^{〔1〕}

还有一部分学者主张要侧重于使用主观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来衡量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情况。他们主要通过随机社会调查来衡量一个社会里的社会信任程度和道德规范水准。比如，由密歇根大学英格尔哈特教授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用这样一个经典的问题——“一般来讲，你认为大多数人是能被信任的吗？”——来衡量各个社会的社会信任程度。^{〔2〕} 布思和理查德进一步发展了这一问题，他们设计了以下三个子项目来衡量被访问者的社会信任：（1）一般来讲，大多数人是能被信任的，（2）大多数时候，人们只关心他们自己，而并不愿意帮助自己的邻居，以及（3）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多数人会利用你。被访问者被要求对这三个子项目做出判断，布思和理查德认为这三个项目合在一起能

〔1〕 Francis Fukuyama, “Social Capital, Civil Society and Development”,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2, No. 1, 2001, pp. 7–20.

〔2〕 Ronald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够更好地捕捉被访问者的社会信任情绪。^[1] 莱克和基费尔则使用社会信任加上公民合作的规范来衡量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分布情况。对于社会信任，他们使用了与英格尔哈特教授同样的问题——“一般来讲，你认为大多数人是能被信任的吗？”——来衡量被访问者的社会信任程度；对于公民合作的规范，他们使用了以下五个子项目：（1）申请自己不具备资格的政府福利，（2）逃避公共交通的费用，（3）如果可能，在报税时进行欺骗，（4）把捡到的钱据为己有，和（5）意外撞到了停着的车辆而不报告。如果被访问者对这五个子项目持否定态度，就被认为具备公民合作的规范。^[2]

最后，一些学者怀疑帕特南所提及的横向社会团体是否适用于对转型社会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析。帕特南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社会团体：横向社会团体和垂直社会团体。横向社会团体有两个显著特征：首先它们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次是其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平等的横向关系；而垂直社会团体往往是在非自愿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内部关系往往呈现出等级结构特征。帕特南进一步认为，只有这些横向社会组织才会产生对社会有益的社会资本，而垂直社会团体只会危及社会资本的发展。而现实情况是，横向社会团体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社会中往往并不存在。因为在这些发展中国家，正式的社会团体往往由国家资助和主导，其内部关系往往呈现垂直特征。^[3]

第二，有些学者对社会资本在美国下滑这一事实提出了质疑。帕克斯顿（Pamela Paxton）通过运用过去二十年里的调查数据，主要是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的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数据，对社会资本在美国社会里的变迁趋势进行了检验，发现帕特南所强调的美国社会里社会资本正在衰落这一事实并不成立。^[4] 首先，在主观层面上，帕克斯顿发现在1975~1994年间美国公众对于其他人的社会信任确实是在下降，每年大概下降0.5%。然而，在另一方面，美国公众对于一般性的政府机构与制度的政治信任并没有任何变化。也就是说，在主观层面上，美国公众的信任水平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滑落。其次，在客观的社会组织层面上，美国公众参与社会团体的数目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唯一的变化

[1] John A. Booth and Patricia Bayer Richard, "Civil Society, Political Capital,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entral America",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0, 1998, pp. 780-800.

[2] Stephen Knack and Philip Keefer, "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ff?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2, No. 4, 1997, pp. 1251-1288.

[3] Anirudh Krishna, *Active Social Capital: Tracing the Roots of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4] Pamela Paxton, "Is Social Capital Decli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 Multiple Indicator Assess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5, No. 1, 1999, pp. 88-127.

可能在于，美国公众与同一社区里的邻居相处时间确实缩短了，但是他们显然更加愿意与社区之外的朋友相处。也就是说，美国公众交朋友的方式可能发生了变化了，他们更加愿意在社区之外寻找朋友，而不是仅仅在同一社区之内。

但是，这一变化对于社会资本的影响到底是好是坏？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看法，帕特南显然认为美国公众这一交朋友方式的变化削弱了社会资本，因为这一变化削弱了同一社区内的凝聚力以及降低了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质量。但是，像帕克斯顿这样的学者则认为，美国公众这一交朋友方式的变化提升了社会资本，因为这一变化使得人们能够与更大范围的不同人群进行交往，从而能够产生更为深远的社会影响。

第三，社会资本与民主运转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一个内生性的自变量，是在社会的历史发展中自然形成的，一旦形成之后，就会对民主政体的良性运转产生独立的、显著的影响。用帕特南的话就是，一个地区的社会资本越丰富，人们的公共精神就越发达，那么该地区民主政府的绩效就越高。

但是，一些学者对此并不同意并提出了挑战。比如著名学者列维（Levi）就指出，政府〔是〕社会资本的来源……为数众多的社会民主理论主张，国家在减少人们彼此之间的充满风险的依存关系中具有重要作用。新经济学制度主义强调国家在制定和保护产权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使得信任成为可能。政治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最近的工作强调了政府机构在建立好斗群体之间的和平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 科里西拉（Krishna）则强调，结构主义驳回了社会资本的主张，声称“公民能力”〔是〕政治、国家建设和社会结构的副产品，社会资本不能够解释制度的表现，恰恰相反，制度是用来解释社会资本的。^{〔2〕}

穆勒（Muller）与塞琳格森（Seligson）则认为民主制度产生信任：“民主在一段时间的持续成功很可能造成公民文化水平的增长，因为高水平的主观政治能力、对政治体制的骄傲和人际信任是一种理性的回应，是对生活在一个稳定民主制度之下的经验的回应。”^{〔3〕}

萨尔兹（Sides）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数据分析的结果支持社会资本与民主政体之间存在相互联系：社会信任水平的增长伴随着民主质量的增长，反之亦

〔1〕 Margaret Levi, “Social and Unsocial Capital”,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24, 1996, pp. 50–51.

〔2〕 Anirudh Krishna, *Active Social Capital: Tracing the Roots of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9.

〔3〕 Edward N. Muller and Mitchell A. Seligson, “Civic Culture and Democracy: The Question of Causal Relationship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8, No. 3, 1994, p. 635.



然。然而，内生性的理论主张看起来比文化理论的主张更有说服力，因为民主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比社会信任对民主的影响要大得多。这些结论可以厘清民主的质量和社会信任之间的关系。萨尔兹提醒人们要注意公民生活更为广泛的政治背景的重要性。社会信任是经常从个人之间的互动中生长起来的，无论是在帕特南所强调的保龄球球馆内，还是如科尔曼（Coleman）所强调的在买方与卖方之间的反复谈判之中。然而，帕特南与科尔曼都太专注于微观层面，而这不应导致我们忽视宏观层面。政治体制的本质决定了公民以何种方式信任他们的同胞。^[1]

总而言之，这些学者强调，社会资本并不是内生性的自变量，对于民主政体的发展水平并不能产生独立的影响。恰恰相反，这些学者认为，民主政体是一个内生性的自变量，对于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诸如社会信任、公民文化态度以及公民能力等会产生显著的、独立的影响。

尽管有着如此的怀疑，更多的学者对于帕特南的理论观点给予了支持与认可。为数众多的学者认为，社会资本会培育民主价值观念，进而会促进民主政体的良性运转。正如牛顿（Newton）所指出的，参与社会团体以及非正式网络会培育社会成员“信任、温和、妥协、互惠互利”的社会美德以及“民主讨论和组织”的技能，这些社会美德和技能会很自然地演变成相关的民主价值观念。^[2]更为重要的是，对正式社会团体以及非正式网络的参与设定了国家权力的界限，防止了国家权力的滥用。正如托克维尔在两百多年前所指出的，“一个社会团体，不管是政治性的、工业性的、商业性的甚至是文艺科学性的，……会捍卫公民的私有利益，防止国家权力（对私有利益）的侵占，保护公共的自由权利”。^[3]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与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通过实证调研发现，积极参与社会网络会提高社会成员对政治事务的认知能力，会培育社会成员的政治效能感，并进而导致政治参与行为，这对民主政体的良性运转是大大有益的。^[4]皮亚托尼（Piattoni）在研究中则发现，积极参与社会

[1] John Sides, "It Takes Two: The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cy", *Institute of Governmental Studies Working Papers* 1999 - 11,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9, pp. 22 - 23.

[2] Kenneth Newton,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c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 40, No. 5, 1997, pp. 575 - 586.

[3]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ed., J. P. Mayer.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1969, p. 697.

[4] Gabriel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网络会让社会成员学习到政治自治的基本规则，从而提升社会成员监督民主政府治理的意识和能力。^[1]

当一个社会或地区的社会成员广泛地参与到社会网络中时（正式以及非正式的），他们就会学习到合作的社会技能和规范，并且由于他们之间往往彼此信任，他们就能更有效地组织集体行动，来监督民主政府治理以及纠正民主政府滥用权力的行为，或纠正民主政府管理中的失效现象。因此，民主政府治理在社会资本相对丰富的社会或地区会变得更加有效以及公正。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通过对世界上几十个国家的价值观念调查发现，作为社会资本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信任，对民主政体的维持与运转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他总结指出，民主政体的维持与运转并不能仅仅通过制度变革或政治精英们的作用来实现，而必须依赖于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2]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更进一步从理论的高度指出，社会资本理论已经成为人类发展领域（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研究的第三代“范式”。第一代“范式”强调实物资本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第二代“范式”强调人力资本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是，第三代“范式”强调人们的交往、结社、彼此之间的信任以及互惠互利的道德规范无疑为一个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的社会奠定了坚厚的基石。^[3]

总而言之，尽管面临着种种的质疑与挑战，帕特南所倡导的社会资本理论已经成为近三十年来政治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理论创新与发展之一，并获得了民主理论家们的广泛认可。对社会资本与民主政体之间的关系，尽管依然充满着争议，帕特南的理论为这一领域的进一步研究，已经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呈现在各位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流动中的民主政体：当代社会中社会资本的演变》，就为全面了解社会资本与民主政体的运转提供了一个全面而丰富的图景。通过阅读此书，我们会意识到，要想更好地挖掘社会资本与民主政体之间的因果机制，就需要研究更多的案例、设计更有效度与信度的测量框架以及架构更有解释力的模型。

[1] Simona Piattoni, “Can Politics Create Community? Evidence from the Italian South”,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98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Boston, September 3 – 6, 1998.

[2] Ronald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3] Joseph E. Stiglitz, “Towards a New Paradigm for Development: Strategies, Policies, and Processes”, Given as the 1998 Prebisch Lecture at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Geneva, October 19, 1998.